

前掌大墓地性质辨析^{*}

曹 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关键词: 前掌大墓地, 年代, 性质, 史族

摘要: 本文在对过往认识辨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前掌大墓地年代的重新检视以及墓地性质的再分析, 指出前掌大墓地并非学界一般认为的薛国遗存, 而应是“史”国墓地, 其很可能是商末弃商投周的殷遗“史”族在西周早期的封国。

KEY WORDS: Qianzhangda cemetery, Date, Nature, Shi Lineage

ABSTRACT: Based on a critical review of previous scholarly work, this study reanalyzes the date and nature of the Qianzhangda cemetery. In a strike contrast with the mainstream viewpoint in literatur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Qianzhangda cemetery should not belong to the Xue state. Instead, the cemetery was situated in the fief belonging to the ‘Shi’ lineage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This lineage betrayed the Shang Dynasty to the Zhou during the conquest.

前掌大墓地自1981年秋发掘始, 前后共进行了10次发掘, 清理墓葬175座, 车马坑5座。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2001年清理的23座墓葬未发表外, 其余均已刊布。材料主要见于《前掌大墓地》^[1](以下简称《报告》)和《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2](以下简称《简报》)。关于其性质的认定, 古薛国墓地说似乎已成为学界公论。但是在仔细检视后, 我们发现其中存有诸多疑点, 其性质尚有可讨论的余地。因此, 本文将通过对过往认识以及墓地情况的重新梳理, 对前掌大墓地的性质做一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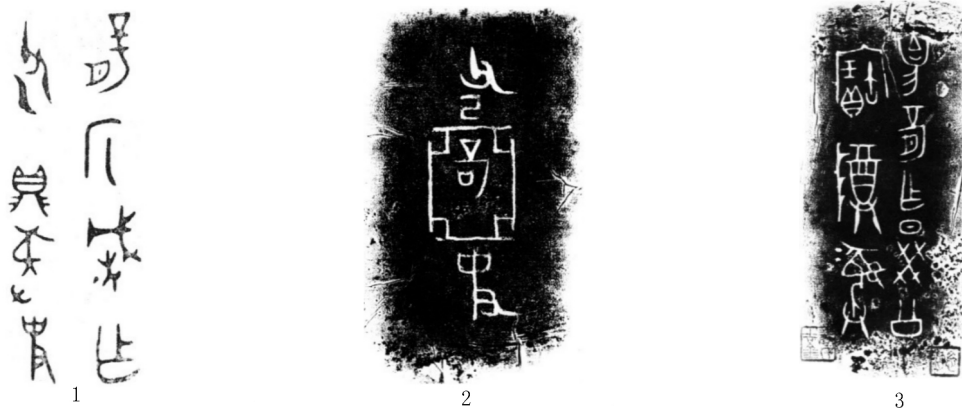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对于前掌大墓地性质的认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墓地发掘之初, 包括发掘者在内的多数学者认为墓地的年代为商代晚期, 性质为奄人文化的墓地^[3], 并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奄的统治中心可能就在滕县一带^[4]。当时虽有学者提出滕州、枣庄传说为夏商时期薛的活动中心, 前掌大遗址当与薛有关。前掌大发掘的商代晚期大墓, 可能是薛国贵族之墓, 有的或许就是薛君

墓^[5], 但这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然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和研究的深入, 特别是王恩田据岐山北郭公社北寨子西沟崖出土的史父乙鼎(图一2)铭文中“亚形薛”和“史”连缀的现象, 认为“史和亚形中的薛字统属族名”, 薛国是由史族所分化, 金文未署“史”字族徽者为薛国器的观点提出后^[6], 包括发掘者在内的多数学者认同前掌大墓地是薛国商阶段先辈所营建, 是商代东方一个方国的墓地的看法^[7]。这也标志学界对于前掌大墓地性质的认识基本达成一致。直至近年, 仍有学者结合历史文献和海岱地区商末周初聚落形态的变迁, 对前掌大墓地属商周时期薛国遗存说进行补证^[8]。总之, 薛国墓地说支持者甚众。

然而, 近年亦有学者提出异议, 李朝远就曾提出多点疑问: 其一, 据《史记·陈杞世家》“滕、薛、邾、夏、殷、周之间封也, 小, 不足齿列, 弗论也。”认为连司马迁都认为小到不足齿列之国, 恐难与“史”之望族相连; 其二, 就冯时等学者所举薛侯鼎“薛侯戚作父乙鼎彝”。“史”(图一1), 首先指出真伪难断, 时代不明。其次, 即便存真, 字形书体显示其为西周中期, 但前掌大墓地“史”字铜器主要随葬在西周早期墓中, 这件薛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代的“东土”研究》(项目批准号13CKG013)阶段成果之一。



图一 薛侯鼎铭、史父乙鼎铭、薛尊铭

1. 薛侯鼎《集成》4·2377) 2. 史父乙鼎《集成》4·2014) 3. 薛尊《集成》11·5928)

侯器无论时代、性质上都看不出与前掌大墓地的关系，“史”字青铜器也看不出与薛有任何关系。最后，青铜器中史器多见，表明“史”曾是商周时期的望族。即使薛侯为史氏，史氏也不一定就全是薛侯。甲骨文中有记“史”，有记“薛”，但无两者同在一处的记录。如果说西周中期以后的史与薛确有关，也不能说“殷之史氏即周之薛侯”；其三，除史父乙鼎外，潘祖荫旧藏西周早期薛尊铭的“薛”前也有一字“𠄎”（图一3），似为族徽的另一种形式。保利所藏荣仲方鼎，铭文后也有“史”的徽记。不能简单的定“史”与“薛”于一身^[9]。

以上所论多有可取之处，只是尚未在学界引起应有的关注。除李朝远先生的三点疑问，我们亦有三点补充意见：

其一，前掌大墓地“史”铭铜器的时代多为西周早期，此外还有部分器形虽属商末，但多出在西周早期墓中。即便有个别墓以及所出铜器时代较早，其最早也不过殷墟四期晚段^[10]。但是在前掌大墓地之外的殷墟，“史”铭铜器出现的时代却要早得多。如殷墟西区 GM2575 的一件卣上就有族徽“史”（图二），而该墓的时代学界普遍认为是在殷墟二期偏晚阶段^[11]。此外，在《殷周金文集成》所收的拓片中亦有出土在安阳、时代为晚商时期的“史”铭铜鼎^[12]。因此，“史”氏在殷墟二期就已生活在王都安阳，其为殷商望族，在西周只是其延续和发展。所以，在前掌大墓地继续繁衍的“史”氏显然和殷商的“史”族的关系更近，而与西周中期才出现在金文上的薛侯扯不上必然联系。

其二，复合族徽的问题异常复杂，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史”和“亚薛”连缀，到底是族的分化还是族的联合都无法明确说明，且同时还存在着“史”与其他族徽或铭文连缀的现象^[13]。假如薛和史族有关，为何前掌大墓地仅《报告》公布的材料中带“史”的青铜器有63件，却没有1件在铭文上标识其和“薛”的关系，而偏偏在时代相近的情况下要在远至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北郭乡的1件器物上标识其和薛是有关的，而且还是“亚薛”？此外，我们知道凡是带有“亚”形的族徽，都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况铭文中还有日名“父己”，所以此“亚薛”可能和殷墟甲骨文中的商“薛”关系更大。因此，在“亚薛”和西周薛国^[14]的关系都不明确的情况下，其更难和殷墟二期就存在的“史”族扯上关系。

其三，前掌大墓地除“史”铭铜器集中出土外，在大致相当于《报告》所划分的南Ⅳ区的于屯北，《简报》公布的已发掘的9座铜器墓中，还有5座墓集中出土“鸟”形族徽铜器9件，比例相当之高。而相反，出族徽“史”的仅ⅢM310:3和ⅢM312:4两例。假如前掌大墓地的“史”与薛有关，那么最新公布的同样从商末延续下来的同一墓地的“鸟”族又当如何解释？

二、墓地年代的检视

鉴于以上异议的合理性，我们有必要对前掌大墓地的性质进行重新讨论。首先，我们先来检视墓地的年代。



图二 殷墟西区 GM2575 出土铜器及铭文拓片

在前掌大墓地发掘之初,对于墓地的年代即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其时代为商代晚期。虽然后来学界将前掌大墓地的性质定为薛国墓地,但对于墓地时代的判断依然认为其主体是在商代晚期。对于前掌大墓地时代判断的转变主要是在《报告》出版之后,《报告》在对墓地 1998 年以前发掘的 111 座墓葬进行整理后发现仅 27 座的时代在商代晚期,其余墓葬时代均进入西周。墓地材料的系统公布,使学界认识到墓地的主体是在西周早期,并非此前认识的商代晚期。因此前掌大墓地年代主体在西周早期是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简报》可能受旧有观点的影响,所定时代明显偏早。如Ⅲ M301,《简报》定在了第一期,即殷墟四期偏早阶段。但该墓所出陶器多为西周早期器形,且共出的一件铜觶(Ⅲ M301:13)体形瘦高,圈足外撇明显,时代明显不早于西周早中期之际,因此将该墓的时代归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比较合适。所以《简报》所定墓葬时代多有偏早之嫌,前掌大墓地数量最多的还应是西周早期的墓葬,如《报告》所定西周早期墓葬的数量就占到了墓地总数的近 76%。至于墓地时代的下限,我们认为当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我们曾划分出的西周中期偏早的墓葬有 M2、Ⅲ M301 等,但是数量是整个墓地最少的。居址的材料最晚的也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如 H2,数量同样很少^[15]。而关于墓地时代的上限,学界一般认为相当于商代晚期,这也是《报告》的意见,但多较笼统。从《报告》中对于几组碳 14 数据年代差距在 150~200 年间的认同,估计作者可能认为墓地上限约在殷墟四期早段或略早,与《简报》对上限的判断比较一致。但是墓

地的上限能否早到此时,特别是《报告》中定在商代晚期的仅 27 座墓葬,其中利于判断时代的陶、铜器墓仅 24 座(其中还有几座只出有陶罐、鬲、甗等),利用打破关系判断的 2 座,其中最大的 BM4 还遭到盗掘,只出有部分铜车马器、原始瓷和玉器等。数量相对较少的墓葬是否能有如此长的时代跨度?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以上 24 座墓中, M108、M213、M49、M36、M39、M117、M124 七座墓葬所出器物我们与其他地区时代明确的器物做过比对,时代均在西周早期早段,此处不再赘言^[16]。BM9、M17、M126、M127、M129 五座只出有铜器,其中 BM9、M17、M127、M129 都是觚、爵的组合, M123 虽共出有陶簋、罐,但是铜器组合也是觚、爵。这种铜器组合多见于殷墟四期和周初,在这之后则比较少见。墓中所出铜觚均为瘦高体觚(Aa 型、Ab I)和带扉棱矮体觚(Ba I)^[17],这类两型铜觚,特别是带扉棱瘦高体铜觚(Aa 型)有明显的晚商遗风,但是其在长子口墓^[18]也有一定的发现,其可延续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是没有疑问的。即便是在同一个墓地,也有可佐证者。M11 出土有无扉棱瘦高体觚(Ab I)4 件,该墓所出的铜簋、扁足鼎、瘦体卣等都具有殷墟四期铜器的一些特点,但是该墓同出的铜鼎、尊、卣、觶等又是明显的周初铜器风格。《报告》也力证该墓时代已进入西周。因此,商代末期铜器多出在周初墓葬中,并与周初铜器在前掌大墓地共存的现象较为多见,这些具有晚商遗风的铜器无论在前掌大墓地,还是其他地区均可沿用至西周。而上述 5 墓所出铜爵的情况也与铜觚类似,均可进入西周。组合形式的保守可能与墓地的族属和性质有一

定关系。此外 M123 还出了一件敞口陶罐,此类陶罐为明显周因素器物,周因素的出现无疑标志着该墓时代已经进入西周,而共出铜觚的时代也无疑是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因此上述墓葬时代最早不过商末,多数都在周初。此外,《报告》中对墓地部分墓葬时代早至晚商的另一个主要判断依据是陶豆。M128、M216、M36、M39、M44、M112 六座墓均出有陶豆,且后五座墓仅出土陶豆。上述墓葬所出陶豆基本为细高柄弧盘豆(Ab型)和粗高柄折盘豆(Ba型)类似的陶豆在殷墟四期以来就有较多的发现,例如郭家庄墓地^[19],其是商文化因素的自然延续。但是通过文化因素对比就可看出,前掌大细高柄弧盘豆(Ab型)明显豆盘更浅、更大,豆柄更高,而粗高柄折盘豆(Ba型)在以上两个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20],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它们的时代可能要略晚于殷墟出现的类似陶豆。同时,前掌大出土的以上两类陶豆还在西周早期的其他遗址有所发现,如 M39 所出陶豆就与河南荥阳西司马遗址所出西周早期偏早 M38:4豆^[21]形制接近。因此,上述 6 座墓葬的时代多数可能已进入西周。此外, M125 仅出 1 件弧鼓腹三角厚唇陶簋(Da型)类似陶簋可沿用至西周早期,在其他地区的遗址都有证可循,而 M24 出土的大敞口圆鼓腹矮圈足陶簋(Ba型)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剩余的 5 座墓都是出罐、甗、甑等,对于这些陶器的变化规律,以往总结的相对较少。但是通过文化因素对比也可以看出,前掌大墓地的类似器物要么与周因素的类似器型接近,要么商因素的器型从类型学上分析可能要略晚于殷墟类似的器型^[22]。而关于殷墟商周分界的问题,近年也有学者讨论。包括主持殷墟发掘多年的学者也认为殷墟四期墓葬的 IV5 段时代可能已进入西周,提出殷墟四期最末段的部分遗存,文化属性上虽可归入商文化,但年代已经进入西周初年^[23]。我们在分析殷墟材料的时候,也注意到例如小屯 76H8 出有 1 件乳状长袋足陶鬲^[24](76H8:9),此鬲为典型的夷文化陶鬲,而这件陶鬲折沿明显,袋足下已无乳突,即便在胶东半岛时代也已进入西周早期,因此小屯 76H8 的时代也可能已进入了西周。因此,殷墟的年代下限可进入周初是有据可证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其实前掌大墓地最早的

陶器,其器型也就相当于 IV5 段的材料,与之相对应的部分商末铜器器型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的地区,因此不仅上述 5 座墓葬,整个前掌大墓地的时代最早可能也就在商末,多数此前归入晚商的墓葬的时代已进入西周,且多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

三、墓地性质的再分析

在对前掌大墓地的时代进行重新检视后,墓地的性质也需要进行重新分析。

其一,从文化因素角度分析,前掌大墓地的商文化因素占到了 70%,且商因素的器类丰富,与其旁的滕国墓地明显有别^[25]。从铜器上看,前掌大墓地出土相当数量的铜觚,而觚在西周早期的张家坡墓地^[26]、琉璃河墓地^[27]等都不见,在曲村墓地^[28]也是数量极少,但在西周早期,确定为商系的墓葬或墓地中,如长子口墓、高家堡戈族墓地^[29]就有大量发现。再如前掌大墓地陶簋、罐等器物上常见的圆形泥钉,在殷墟晚商时期的郭家庄等墓地都有一定的发现,这些特征都暗示其和商文化的密切关系。再加上“史”又是晚商望族,已知最晚在殷墟二期就有铭文材料证明其已生活在王都安阳,显然前掌大墓地与商文化联系密切,其与任姓封国的性质明显不符,所以对其性质的判断也应建立在商文化某族墓地的基础上。

其二,从葬俗上分析,《报告》中前掌大墓地带墓道大墓集中分布的北 I、II 区,除 BM1、BM5、BM6、M207、M212、M217、M223 无腰坑外,其余 28 座均有腰坑且绝大多数有殉狗,甚至一部分带墓道大墓还有殉人。而在上举 7 座墓葬中,前 5 座均是墓室面积在 1.5 平方米以下且墓主年龄多鉴定为儿童的小墓,最后一座墓虽无腰坑但是二层台上还有殉狗。其他墓区的情况也基本与之类似,中型墓基本都有腰坑或殉狗。然其旁的同时代的庄里西墓地的葬俗特点却与之截然相异。就在近年公布的庄里西西周早期墓葬的材料中^[30],多数墓葬无腰坑殉狗,且所出陶器多为周因素的器型,此外铜器中还有銜铃^[31]、盾易^[32]这样的西土集团铜器,而这些周因素的器物都基本不见于前掌大墓地。庄里西由于早

年发现有滕侯墓,再加上文献对滕国地望的记载,其为姬姓滕侯的封国所在地学界并无异议。所以,两个相邻的墓地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葬俗特点正好展现了其一个商系、一个周系的墓地性质。

其三,通过对《报告》中族徽铜器的统计,“史”字族徽的铜器有63件,其他族徽铜器仅有17件。《简报》中村“东南”墓地仅有“史”字族徽的铜器有3件。“于屯”村北墓地“史”字族徽铜器2件,“鸟”形族徽铜器9件,其他族徽铜器6件。有多年来专门研究铜器族徽的学者通过对商周之际到西周早期墓地的分析,提出“如果出土的青铜器上有数量较多的族徽文字,而且这些族徽相同,或者虽然族徽不同,但其中有一种族徽占有相对优势(超过三分之一),那么基本上可以推定这个墓葬或墓地的主人是殷遗民。”^[33]而前掌大墓地“史”字族徽铜器占有压倒性优势,所以铜器族徽也支持我们对于墓地商文化属性的判断。从族徽反映的信息看,“史”族应为前掌大遗址的统治族群,“于屯”北的“鸟”氏是其统治下的一个部族,其均为殷人后裔。

其四,前掌大墓地的年代上限最早至商末(或可晚至商周之际),假如关于殷墟商周分界的现有认识站得住脚的话,其整体的时代还可能进入西周^[34]。而在前掌大墓地发掘之时,也发现整片墓地有打破中商时期灰坑的现象。我们在对前掌大墓地做调查的时候,也曾采集到被墓葬打破的灰坑中出土的殷墟一、二期陶片^[35]。但是整个鲁南地区公布的商时期材料中,基本不见殷墟四期的材料。《报告》中少量晚商时期居址的材料,要么是以假腹豆为代表的殷墟三期之前的器形,要么就是西周早期的器形。此外,铜山丘湾祭祀遗址^[36]同处泗水流域,其殷墟四期遗存地方化明显,也可从侧面印证大约在殷墟四期阶段,商王朝已经失去了对泗水流域的控制。而《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记“武乙衰蔽,东夷浸盛,遂分淮、岱,渐居中土。”由于前掌大墓地的时代上限为商末,而安阳在殷墟二期就有“史”族的铜器出土,因此望族“史”氏在晚商显然居于殷墟而不在鲁南地区。因此,前掌大墓地和滕国墓地一样,都是从它处迁徙而来,并非是本地族系的发展和延续。而前掌大墓地商文化因素和本地文化因素的明显差别也可佐证这一点。

其五,在对西周早期的墓地做横向对比后发现,前掌大墓地和高家堡戈族墓地、宝鸡弼国墓地^[37]等非常类似,都繁盛于成康时期,铜器也多集中在此时期,但是在进入西周中期之后迅速衰落。特别是高家堡戈族墓地,时代上较早的91SJGM4出土铜器就有许多晚商遗风,只是地处周王朝首都丰镐之北的泾阳,很容易理解墓地的上限在商周之际,以及其是商周之际叛商投周的殷商“戈”族在王畿之北封地的墓地性质。因此,前掌大墓地与之的相似性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两者年代以及性质上的类似。

其六,即便周王朝在西周早期采用怀柔政策,我们也未曾发现有一例商文化遗址是在本地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且在成康之际达到最高峰的^[38]。在周王朝统治范围内,全国各处无一例外都是伴随着周初分封,各封国才进入各个地区,其封地在周初都有变化。虽绝大多数都在成康时期达到了顶峰,但是在穆共之际,可能伴随着周王朝实力的巩固以及统治政策的变化,一些遗址,特别是殷遗或非姬姓的封国迅速衰落。因此,这也从侧面说明前掌大墓地的时代不可能跨入晚商,最多如墙盘所记微氏高祖一样,在殷末弃商投周。

其七,商人诸宗族本就各为一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实体,特别在晚商时期商王与诸宗亲间亲族关系疏远、正常宗法关系泯灭的情形下,诸强宗大族进一步独立,并促使了整个商人共同体的瓦解^[39]。在此背景下,随着西土周族的强盛,《史记·殷本纪》记有“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金文如墙盘记有微氏高祖在商末投周。而周初重新分封的殷遗见于文献的有微子、纣子禄等,见于考古材料的有“戈”族等,所以“史”族弃商投周从而受封也是情理之中。

其八,前掌大墓地在北Ⅰ区集中发现了12座带墓道大墓,其中两条墓道的3座,墓葬规模最大的BM4墓室面积达到了50平方米,时代以及墓葬特点都与周初商系的鹿邑长子口墓最为接近。这在山东地区西周早期是绝无仅有的,其旁的滕国墓地的现有发现也远远不及。即便在已知的西周早期封国墓地中,也只有琉璃河燕国墓地、随州叶家山曾(随)国墓地可与之媲美^[40]。而琉璃河燕国墓地带墓道的大墓也仅发现5座,

已公布的 II M202 虽也是两条墓道,墓葬面积也只有 37.44 平方米。M1193 的四条墓道争议较大,但是其为燕国第一位侯“克”之墓学界并无太大异议,但其墓底的面积也只有 19.26 平方米^[41]。而在整个墓地的规模上,前掌大墓地还要略胜一筹。叶家山墓地无论带墓道大墓亦或墓地规模都与之接近,但是司马迁在描述该国时明确指出“汉东之国,随为大”^[42]。因此,前掌大墓地绝非如司马迁所称的与滕国一样“小,不足齿列”之国可以匹配的。

其九,前掌大墓地和其旁的薛国故城在时代上并无交集,其实际上是一兴一废的关系。前掌大墓地在穆共之际衰落,而薛国故城的内城在西周中期偏晚阶段才开始建造。其变化一是和西周中期整个西周格局的变化同步^[43],另一方面可能正是由于周王朝统治政策的变化,才使得周初类似封国逐渐衰落,而薛国改封至该处,也意味着周王朝新的统治政策和历史格局的形成。

其十,前掌大墓地带墓道大墓遭到了严重的盗掘,墓中未出土带有铭文的铜器材料,这也对于其族属的判断造成了一定困难。由于文献记载,《尚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今本《竹书纪年》也记“三年……遂伐奄,灭薄姑。四年……王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正在奄,迁其君于薄姑。”从中可知,周王朝灭商奄是在成王时期,时代上显然与前掌大墓地不符,因此其不可能为商奄的遗存。而在墓地有限的文字线索中,中字形大墓 M214 西侧的 M213 里出有“史”铭的铜器,且两墓时代大致相当,可帮助推断前掌大墓地的族属与“史”氏直接相关。若再加上墓地“史”字族徽铜器占绝对优势的事实,前掌大墓地的性质只能认定为“史”国墓地。

四、结语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前掌大墓地与薛国无涉,其应是“史”氏望族统治下的史国墓地。由于安阳在殷墟二期就发现有“史”族铜器,而前掌大墓地的年代上限早不过商末,因此,其很可能是商末殷纣衰微的形势下,如同涇阳高家堡“戈”国等殷商贵族一样弃商投靠周王朝,并受封于前掌大一带统治该地区并维系族群发展的

封国墓地。所以,前掌大一带是“史”族在商末周初建立的方国,其统治在成康时期达到了顶峰,但是随着周王朝统治政策的变化,在进入西周中期之后就迅速衰落。在当地继之而起的,是位于其西、以薛国故城为代表的任姓薛国遗存。

-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前掌大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2]滕州市博物馆. 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C]//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岱考古(第三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3]胡秉华. 滕州市前掌大商代遗址[N]. 中国文物报, 1989-3-10.
- [4]邵望平. 《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C]//苏秉琦. 考古学文化论集(2).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5]张学海. 论四十年来山东先秦考古的基本收获[C]//张学海. 海岱考古(第一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 [6]王恩田. 陕西岐山新出薛器考释[C]//《考古与文物》编辑部. 古文字论集(一). 1983.
- [7]胡秉华. 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地面建筑浅析[J]. 考古, 1994(2).
- [8]方辉. 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国族问题[C]//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考古学会第15次年会论文题要汇编. 石家庄, 2012.
- [9]李朝远. 前掌大墓地中的“史”及其他——读《滕州前掌大墓地》[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中心. 东方考古(4).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10]《报告》基本持这样的观点。笔者在《前掌大墓地的分期和年代》(待刊)一文中也有详细论述。
-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青铜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鼎·1078(修订增补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3]其实“史”与其他族徽或铭文连缀的现象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以来比较多见,很多都有可能是作为“史族”与其他族氏的复合的情况,只是“史”还可作史官理解,所以较难下断语而已。
- [14]西周时期受封于鲁南地区的薛国为任姓,文献并无分歧。
- [15]曹斌. 鲁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分期和年代(待刊).
- [16]同[15].
- [17]型式划分和具体分期可参看: 曹斌. 鲁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分期和年代(待刊). 下同,不再特别说明。
- [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周口市文化局.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年.
-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 [20]详细可参看:曹斌.鲁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J].考古与文物(待刊).
- [2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荥阳西司马遗址晚商墓地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09(3).
- [22]我们在做文化因素对比时所选的对比陶器也多为相关报告所划分的殷墟四期偏晚阶段的器型。具体可参看:曹斌.鲁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J].考古与文物(待刊).
- [23]唐际根,汪涛.殷墟四期文化年代辩微[C]//刘庆柱.考古学集刊(15).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4.
- [25]曹斌.鲁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J].考古与文物(待刊).
-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 [2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 [2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地[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 [30]杜传敏等.1989年山东滕州庄里西西周墓发掘报告[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1).
- [31]a.孙机.中国古独轴马车的结构[J].文物,1985(8). b.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C]//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中心.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32]曹斌.商周铜易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1(3).
- [33]张懋镠.如何利用族徽铜器识别西周早期墓地的族属[C]//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 [34]目前其他地区零散的“史”铭族徽铜器都出在时代明确的西周早期单位中,如喀左山湾子窖藏出土的史方壘、郑州洼刘 M1 史父辛鼎、宝鸡石鼓山 M4 史器等。此或可作为前掌大史国墓地时代在西周前期的一个旁证。
- [35]在断坎上墓葬打破灰坑的迹象明显,陶片也采集自断面的灰坑。
- [36]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J].考古,1973(2).
- [37]宝鸡市博物馆.宝鸡西周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38]目前的研究虽显示苏埠屯墓地的时代已进入西周,但是在西周时期呈明显衰落之势,并迅速消亡,其与前掌大墓地在成康时期繁盛的情形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迹象。
- [39]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 [40]虽然浚县辛村卫国墓地 M1 的墓室面积达到了 95.4 平方米,但是该墓的时代发掘报告(郭宝钧.浚县辛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定在了墓地的中期,时代推断为孝夷厉宣时期。
-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0(1).
- [42]关于叶家山墓地的性质尚有争议,但是目前支持该墓地为姬姓和曾、随一国说的材料相对较多。详细可参看黄凤春先生最新的文章(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江汉考古,2014(2).
- [43]如此前所论述的一批封国都在穆共之际迅速衰落。

(责任编辑 李自智)